

王小盾◎主编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小盾◎主编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王小盾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01-009500-4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文学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I2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016 号

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论集

GUDAI HANWEN XUE DE SHENG CUN YU CHUANBO YANJIU LUNJI

王小盾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7-01-009500-4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王小盾

一

2009年11月下旬,四川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几所省属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聚在成都狮子山下,围绕“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本书是对这次讨论的总结。它意味着有一些居住在偏远省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按一条新的研究思路相约迈开了脚步。这些人或许会使一个尚处于边缘的文学研究思潮,渐渐成为新世纪的学术主流。

以上信心源于对这条新思路的理解。它包含以下四个关键词:

(一)古代。汉文学的“古代”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文化概念。它指的是东部亚洲汉字文化区的时代。它起于汉字初成之时,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改变了全世界的文化格局,汉文学随华侨的扩散而进入它的“现代”,即全球时代。

(二)汉文学。它指的是使用汉语言文字的文学。除中国的汉文学以外,既包括使用汉字而未必使用汉语的文学,例如古代越南、日本、琉球、朝鲜半岛的文学,也包括使用汉语而未必使用汉字的文学,例如分散在中亚地区的东干文学。

(三)生存。文学是依靠一定条件而生存的。只有揭示了这些条件,才

能揭示文学种种样态的原理。从人类学角度看,文学有作为仪式的生存;从历史学角度看,文学有作为文人聚会活动、民众聚会活动的生存;从宗教学角度看,文学有作为宣传手段、作为广场艺术的生存;而从经济学角度看,文学的每一种生存,都须依赖一定的“恩主”。文学的功能很丰富,有几种功能就有几种生存;文学的生存也很奢侈,有几种生存方式就要求有几方面物质基础。

(四)传播。完整的文学活动包括三个环节:制作、传播、接受。传播是这一活动的中心环节,也是使文学得以获得其存在形式的关键。从语言角度看,这一环节采用了吟诵、歌唱、说唱等手段;从文字角度看,这一环节采用了铭刻、书写、印刷等手段。而在传播和制作相交叉的领域,有种种编纂手段;在传播和接受相交叉的领域,有种种著录手段。

以上四个关键词,代表了“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的研究范围和重点。也就是说,在这一主题之下,我们将以古代汉文学为对象,考察它的种种生存状态,包括作为仪式、作为聚会活动、作为宣传手段、作为广场艺术的生存,也包括这些生存所依赖的条件;同样,我们将考察古代汉文学的种种传播方式,包括它用于传播手段的吟诵、歌唱、说唱、铭刻、书写、印刷,也包括它的编纂和著录。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学术思路,是因为和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相比,它有以下四个优点:

第一,它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它所研究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而是包括日本、越南、韩国、朝鲜在内的东方古典文学整体。在过去几千年里,上述诸区域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实体,理应成为同一学科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过去的研究应当是有所提升的。过去的研究主要以中国大陆的汉语作家文学为对象,对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的关联有所忽视,也对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汉文学的关联有所忽视。我们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第二,它有比较宏大的目标。它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艺术珍品,而是要去探讨文学的真相。如上所说,文学在社会中的真实存在,至少包括创作、传播、接受三个环节。在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传播,因为文学活动是通过它而得以实现的,文学创作的样式也是由它规定的。从研究的角度看,

传播是文学活动中最具规律性的因素。如果说作家、作品代表了文学史上的一次性事件,那么,传播就是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具备“长时段”的质量。因此,它是最容易把握、最值得探究的事物。就此而言,我们的工作既具有披沙拣金的意义,也具有拾遗补弊的意义。因为过去人所关注的作家和作品,只属于“创作”这一环节;所关注的文学批评,也只是“接受”的组成部分。

第三,它有比较科学的路线。传统的文学研究重视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侧重考虑它同审美风尚的关联。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说明事物的“当然”;但它却不太容易说明事物的“所以然”,因为它是从精神到精神的平面研究。我们的工作与此不同。我们不排除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但我们更注意富于层次的比较研究,注意通过物质去考察精神、通过行为去理解思想、通过社会存在去认识社会意识。我们的意图是探知事物和事件的本质,理解事情的原因和原理。

第四,它有比较深刻的追求。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什么?通常的看法是娱情、陶冶、审美,我们则认为是表达思想、交流文化、征服人心。我们认为,汉文学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便是通过表达思想、交流文化、征服人心而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我们注意到,在历史上,汉文化向四周的扩大,总是以汉文学为先驱的;汉文学的边界,总是略大于“中国”的边界。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汉文学,那么现在的“中国”便只是河南省中部的一个小小的地区。但历史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造就了不断发展的汉文学;随着汉文学的传播,汉文化逐渐覆盖了自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同这一历史事实相对比,过去的工作便不免显得有些狭隘了。为此,我们主张扩大视野,考察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发生影响的问题,重新认识文学,认识文学的功能,认识实现文学之功能的方式。

总之,我们认为,人类的视野是随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变革的时代已向文学研究提出变革的要求。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我们应该依据这一事实来建立新的研究方向。文学研究主要是创造知识的工作,而不是创造价值的工作,它势必走上科学的道路。正是这一切,规定了我们的学术路线。我们所进行的“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研究,其在思想方法上的特点就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面对汉文学整

体,主要用探讨规律的方式,而不只是描写表面形貌的方式,来研究文学现象的原因和原理。

二

不过,以上认识并不仅仅属于某一群人,它是在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最近几十年,各国研究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与这些认识相接近的一些要点。比如法国远东博物院联合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韩国等地的研究者进行了东方各国小说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这项工作,乃把古代的汉字覆盖区看作一个文化实体。又如南京大学等许多高等院校,已注意发展域外汉文古籍研究和域外汉学研究。这些工作在上述意义之上,进一步强调了全面考察基本史料的研究路线。另外,在敦煌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研究、印刷术和文学关系研究、汉文学文体研究等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力已经转变了,已经从作家作品研究转变到对文学的长时段现象进行研究。这种种情况,势必促成一个系统的、关于“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的研究思路。

正是在认识上述学术形势的同时,我们认识了自己。可以说,我们以往工作的意义,同样在于促成“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这一系统认识。比如,1982年,扬州师范学院建立起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围绕博士点的培养,它建立了对文学与文化作综合研究的特色。这包括任半塘教授的唐代文艺研究,其代表作有《唐声诗》、《唐戏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教坊记笺订》、《优语集》;也包括徐沁君教授的戏曲文化研究、李廷先教授的扬州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谭佛维教授的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谢伯阳教授的明清散曲研究,其代表作分别有《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唐代扬州史考》、《王国维诗学研究》、《全明散曲》和《全清散曲》。前辈学者所建立的传统,在新一代扬州学人中得到了发扬。当前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工作,因此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重视在较宽阔的视野中建立汉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例如董国炎、许建中、陈文和、陆永峰等人编写了《全辽金文》、《文献研究》、《全元曲校

注》、《钱大昕全集》、《王鸣盛全集》、《禅月集校注》等文献考据著作；又如黄强的科举文学和文体研究、汪俊的宋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研究、顾农的建安文学和文学集团研究，皆重视史料辨析。

(二) 重视多学科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史和文学史的比较研究，二是学术史和文学史的比较研究。前一方面有王永平的汉魏六朝社会史与文学史的比较研究。在这个领域，他著有《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等书。后一方面有田汉云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他著有《六朝经学与玄学》等书。

(三) 重视考察长时段现象和文学史规律，重视研究文体、文学集团、文学思潮等重要的中观事物，以实现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结合。这方面例证有：董国炎著《明清小说思潮》、黄强著《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许建中著《明清传奇结构研究》、王永平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这些著作分别从思想史、文体史、社会生活史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也论述了历代文学在艺术精神和创作体制方面的继承与革新。除此之外，扬州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还承担了“唐宋八大家与时文”、“唐代僧诗研究”、“晋江宝卷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中地域文化和文人分布问题”等课题。其中“平民文学两次兴起：评话小说研究”、“文学的雅俗流变与整合：从民间戏文到文人传奇的文化研究”、“秦文化视野下的东周秦文学”、“中国古代诗歌在越南的移植研究”、“道情及其源流研究”，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有较深厚的历史积累。这里是楚辞学的重镇。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教授，从文字音韵之学进入辞赋之学，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等著作。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在整体研究中揭示事实真相的特点。他所提出的“相互渗透，果中求因”、注重会通的学术思想，也在新一代学者那里得到了贯彻。例如万光治著《汉赋通论》、李大明著《九歌论笺》、《汉楚辞学史》，便是整体研究与具体考证相结合的著作。四川师范大学也是文学文献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和巴蜀文化研究的重镇。屈守元教授著《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韩诗外传笺疏》、《韩愈全集校注》等，分别是《文选》学的重要专著

和以校注之法研究《韩诗外传》、韩愈诗文的集大成著作。另外,在唐代文学、巴蜀文化研究方面,除屈守元教授著有《刘禹锡研究》外,王仲镛教授所著《唐诗纪事校笺》,是以文献考据之法研究唐代文学的范例;王文才教授关于杨慎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系列著作,则具有鲜明的蜀学个性。这几方面学术传统都得到了延续。例如现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吴明贤关于唐代诗人入蜀的系列考证,便可看作文学文献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巴蜀文化研究的综合。

2008年,为促进人才培养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建立了“古代汉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科研创新团队。这个团队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由以下八人组成:

王小盾,57岁(当时年龄,下同),文学博士。主要进行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早期文化研究、域外汉籍研究。著有《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艺术》、《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等著作。曾经主持和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传播方式与中国诗体的变迁”、“《乐府诗集》研究”、“《高丽史乐志》研究”。

李诚,55岁,曾在汤炳正先生指导下取得硕士学位。专长《楚辞》和中国早期俗信仰研究。著有《巴蜀神话传说刍论》、《楚辞论稿》等著作。正在进行“口头形态和写本形态的中国早期叙事研究”。

熊良智,54岁,曾在汤炳正先生指导下取得硕士学位。专长《诗经》、《楚辞》的考据学研究。著有《楚辞文化研究》等著作。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辞的传播形成与作家文学的诞生”。

哈磊,40岁,文学博士。专长佛教原理和中国佛教史研究,著有《四念处研究》等著作。

汤琚,35岁,文学博士。著有《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等著作,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金汉文典籍在西夏的流传及影响研究”。

赵俊波,35岁,文学博士。著有《中晚唐赋分体研究》等著作,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律赋研究”。

汪燕岗,34岁,文学博士。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雕版印刷与明

清通俗小说的出版”研究。

庄逸云, 33岁, 文学博士。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研究”。

概括说来, 这个团队有两个特点: 其一, 它的研究方向是依托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立起来的, 具有一定的学术活力; 其二, 它的主体是一批年轻的文学博士,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事实上, 这也是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点。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有8名40岁以下的年轻博士; 他们的研究专长, 同样覆盖了包括先秦地域文学研究、越南诗学研究、明清两代佛教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在内的较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三

唐代有一句成语, 叫“扬一益二”, 意思是天下物产之盛, 在于扬州和成都。这成语仿佛是为今天预备的。我对这句成语的理解是: 来自扬州和成都的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学学术集体, 既然有相近的风格, 有共同的志向, 那么, 它们就应该携起手来, 为中国学术作出自己的贡献。

按照计划, 我们将于来年春天、烟花三月之时, 在扬州再次聚首, 讨论未来两三年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结晶为以下研究成果:

一、关于早期汉文学和汉文学专题史研究

1. 《汉文学的早期形态》(王小盾)
2. 《周秦方国和东周秦文学》(倪晋波)
3. 《楚辞的传播形成与作家文学的诞生》(熊良智)
4. 《口头形态和写本形态的中国早期叙事研究》(李诚)
5. 《先秦传体研究》(柳宏)
6. 《游侠文学的形成及其早期传播》(贾立国)
7. 《文学文献编纂与著录论考》(李大明)

二、关于中古汉文学研究

- 8.《唐代诗人入蜀考》(吴明贤)
- 9.《古代童蒙教育与文学》(戴健)
- 10.《宋代李白接受研究》(王红霞)
- 11.《宋金汉文典籍在西夏的流传及影响》(汤珺)
- 12.《科举文体和中古社会》(赵俊波)
- 13.《中古诗歌的音乐传播研究》(王立增)
- 14.《宋代对宋前文学的接受》(汪俊)
- 15.《宋明学官与俗文学的传播》(葛传彬)
- 16.《金代俗词的生存状态与传播方式》(王定勇)

三、关于近世汉文学和汉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

- 17.《中国口述史小说研究》(董国炎)
- 18.《南方宝卷研究》(陆永峰)
- 19.《明清通俗小说和雕版印刷的关系》(汪燕岗)
- 20.《清代两淮盐商的文学活动研究》(明光)
- 21.《宋词在清代的生存》(曹明升)
- 22.《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研究》(庄逸云)
- 23.《宋以后的科举文体及其域外传播》(黄强)
- 24.《中国古代诗歌在越南的移植》(何仟年)
- 25.《汉语叙事文学在越南的传播》(朱旭强)

对以上这个由 25 部著作组成的计划,我们尚不敢乐观。古人有云:“方其搦管,气倍于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现在只是“搦管”之时,等到“篇成”,也许逃不掉“半折”的命运。不过,我们却愿意和各位读者共享这一计划。因为我们希望用它来求取同行读者的批评和督促;或许,它也可以成为有更多人参与的事业。

目 录

前言	王小盾 (1)
----------	---------

第一部分 早期汉文学和汉文学专题史研究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熊良智 (3)
文化接触、民族认同与春秋秦文学的发生	倪晋波 (17)
早期咏侠歌谣俗谚的生存与传播	贾立国 (28)
——以两汉作品为例	
浅谈中土佛寺与世俗民众的关系	陆永峰 (41)

第二部分 中古汉文学及其文献研究

唐代试赋的命题研究	赵俊波 (65)
——以试赋题目与九经的关系为中心	
试析《书言故事》之流变与传播	戴 健 (75)
——兼论书商对童蒙读物之影响	
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	常思春 (89)
柳词与道教	王定勇 (104)
试论严羽《沧浪诗话》对李白的的评价	王红霞 (129)
黄丕烈对宋人词籍的收藏与整理	曹明升 (146)

第三部分 近世汉文学研究

- “口述史小说”的生成与演变 董国炎 (159)
- 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 黄 强 (169)
- 游戏八股文概观
- 《醒世姻缘传》中明代书籍免税史料一则 葛传彬 (187)
- 金兆燕诗文中的“依人”表现与反思 明 光 (194)
- 金兆燕与两淮盐官、盐商关系述论
- 元代南曲散曲佚文辑录 许建中 (209)
- 复古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庄逸云 (240)

第四部分 汉文学的传播研究

- 关涉北宋人物的越南古代叙事文本述论 朱旭强 (253)
- 元代使越文学与汉文学在越南的传播 王 皓 (264)
- 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经《华严经》叙录 汤 珺 (282)

第一部分

早期汉文学和汉文学专题史研究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熊良智

屈原是楚辞文学的开创者,楚辞的文学传统也是以屈原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可是,屈原这个历史地位却一直遭到质疑。虽然,屈原是否有其人的说法近年已经渐渐地消失了,但他与楚辞文学的关系,是否楚辞学家仍然有人持否定态度。日本学者冈村繁“对赋予屈原以楚辞文学伟大作家的身份终究想持怀疑的态度”^①,他认为这是“把屈原这样一位楚辞文学的主人公偷换成楚辞文学作者”,“汉初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是仅仅当作忠臣来对待”^②,今天更有学者宣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③因为他们的理由是:“‘楚辞’的名称未见先秦文献,始出汉代。”^④“从战国末年到汉代,凡是这时期中的文献里面,既没有关于‘楚辞’的传说,也没有提到《离骚》或《九歌》等篇的记载。”^⑤对汉代的相关文献,包

① 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 页。

② 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一卷《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59 页。

③ 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辨》,《复旦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3 页。

④ 同上。

⑤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中华书局 1948 年版,第 8 页。

括司马迁《史记》、王逸《楚辞章句》等也多否定。笔者以为,先秦存留后世文献本就有限,迄今也的确未见有关屈原、楚辞的相关记载。但是我们认为,作品是作家的标志,而作品的流传,不仅证明它的选择与接受,更证明了它的历史存在。楚辞有鲜明的拟骚传统,大量的诗句因袭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观察视角和途径。

一、关于屈原与楚辞的流传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作了一篇《瓠落的文学史》的文章,就从具体的书写方式中提出问题。他说: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屈原在自沉以前写了《怀沙》?他确实把它书写在竹简上了吗?

到底有没有证据向我们证明《怀沙》是“书面”创作的?有一个可能是《怀沙》最初只是口头创作,在口头流传,后来才被写下来的。在“写”一个文本和“写下来”一个口头流传的文本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差别。如果《怀沙》是屈原的口头创作,那么是谁把它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带回文明世界的呢?^①

这其实已经涉及了传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问题。宇文所安提出的疑问,早在上世纪60年代,蒋天枢先生《楚辞新注导论》就有了思考,他说:

其(屈原)沈江前有无亲属相随亦无考。当屈原南行时,随同前往者至少应有三五人。屈原至江南后亦可能有继至者,其人殆皆屈原平日揽取为佩之“芳草”,皆所谓无名义士也。屈原死前,当有所嘱托:得间北归,以己死事报王。《怀沙》、《思美人》、《惜往日》、

^①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